

【社会洞察】

一旦用漂亮言词言说

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说:“看看一些中国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关于“两样的架子”,咱们瞧,一官员作报告,威风八面,口吐莲花,这“主义”那“信念”,说的话比唱的歌动听,叫人感觉,这人情操高尚,心灵澄澈——是为“一样”;没过两日,此人猝然落马,原来他是个贪脏枉法、道德败坏的混蛋——是为“另一样”。

鲁迅之笔如解剖刀,把这类人的灵魂剔削得纤毫毕露。您瞧,那班贪官跻身于精英阶层,位高权重,手握国计民生大事项。但他们对于信仰所持态度,肯定并非“信”和“从”,而是“怕”和“利用”。如鲁迅说,只因他们是“善于变化,毫无特操”的,所以他们“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一人两制”——内心龌龊,架子辉

煌,貌似浑然一体,实则泾渭分明。

克尔凯郭尔说:信仰实际上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信仰以弃绝为前提”。也就是说,是要弃绝私心,要付出和奋斗,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紧盯权势、金钱、美女之人,眼中“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语),可以说只有私欲而无节操,即是无信仰之人。在他们身上,只有关于信仰的言说,而这言说是用以掩饰内心并蒙人的。

既欲掩饰和欺骗,则必然“做戏”。诚如鲁迅在《宣传与做戏》一文所说:“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便是‘做戏’。”一般人做做戏,也罢了,官员做戏贻害无穷。他们给人以假象,具有极大迷惑性,居然可以令单纯者向往、崇敬,生出追随、奉献的欲望。但国计民生岂是儿戏?何况,这“戏”背后隐藏着那么多阴谋、污秽和舞弊。而一旦除去粉墨,脱掉行头,贪官们曝出庐山真面,被愚弄者的干劲、热情、依托之心等美好情愫,便加速消逝,社会于是陷入更

大的道德和信仰危机。

布“道”之人,自身并不信“道”,却反其“道”而行之,普遍的“不相信”,又成为“‘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鲁迅语)。贪官做假,“刁民”弄小伎。你暗中搞“转型”,将国有资产攫入自家囊中,洋房豪车美女皆备,我明着坑蒙拐骗,赚点不大不小外快,至少筑个安乐窝,老婆孩子热炕头。二者巫之大小迥异,性之恶者相通——只是,“刁民”不大谈什么“信仰”。

对于为官者,咱们须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比如信仰,如路德说,“一旦用漂亮言词言说,即已远离信仰本身”。一些贪官们惯讲美丽大话,很多时候是鹦鹉学舌,为的是装潢门面,绝不实行。那班赃官,无一不伪。所以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就呼喊过:“伪士当去!”咱们必须长个心眼儿,多从这一点“预察”为官者,时刻警惕他们的作为,别等他们骤然被查,才惊叹其“伪”。

□王乾荣



如果在世界上推举比较苛刻的民族,我想,咱们中国人有资格候选甚至是当选。

一些人的苛刻是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比如你要在人群中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向别人打听,于是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一个个头不高的胖子,有点秃顶的就是。”或者,“长得黑不溜秋的”。指点者之所以要这样说,目的绝对是为了让寻访者很容易、很轻松地找到目标。因为对于一个陌生对象的判断,特征是最重要的。以上所说是不是特征呢?无疑是。但同时,这些特征又是人的缺点或缺陷。有的人偏偏爱以这种生理缺点作为标志,自己注意了也唤起别人的重视。这里边就或多或少地隐藏着阴暗的动机。说者浑然不觉,而被描述的一方也不以为然。访问者所得到的首先是寻找对象生理上的不足,因而也就暴露了指点者对人的审美判断上的苛刻。

【谈古论今】

孔子接受“跪拜”吗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各地祭拜孔子像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报道说,有私人国学夏令营甚至把跪拜孔子像作为惩罚不听话学生的手段。这是对孔子的尊敬还是亵渎?

形式主义这个东西,历来害人非浅。尊师重教,固然重要,但一旦落入形式,很容易“变味”。拿跪拜来说,早在民国建立初期,这个带有明显封建社会痕迹的礼仪便被废除,一百多年来,平等观念已成为人们社交礼仪中的共识,时不时请出跪拜礼,显然不合时宜。

社会掀起传统文化热,真喜欢、假喜欢传统文化的人一窝蜂涌来,汉服热销、为圣贤下跪频现,看上去就差搭时光机穿梭回古代了。好不热闹的表象下,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说其中没有叶公好龙的投机者。

在传统中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来时路,当然是好事,但有时也得低头看看我们的当下与前路。人类用了上千年的努力才进步到现在,何必再让孩子们动辄下跪呢?

科研、治学离不开争论,科学面前没有绝对的权威,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便是这个意思。就拿尊孔来说,作为大教育家,他既注重维护师道尊严,也鼓励怀疑,对后生晚辈更是不吝鼓励,比如他曾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崇拜而不是“跪拜”,才能将孔子的思想和精神学深学透。



漫画/曹一

还有人爱打着各种权威的幌子为给孔子下跪寻找“合法性”,实际上现代学者们论述继承传统文化时,大都强调要去粗取精,有所辨别,而不是一味盲从,全盘照搬。毕竟现在早已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何必要通过跪拜彰显一个人或是一种思想的权威呢?

有一篇文章介绍说:学者辜鸿铭一生

崇尚儒学,醉心于传统文化,他一生留辫子、戴瓜皮帽、穿长袍马褂,过于传统。但面对当时孔教会大搞祭拜孔子,却不以为然。有一次他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辜鸿铭甚至认为:孔教会只是形式上尊孔,不是真的遵行孔子学说,是典型的虚有其表、舍本逐末。

□丁辉

摄像头啊,摄像头

在我曾工作过的那所省重点中学、后来的国家级示范高中,有一年为了验收所谓的“国家级示范高中”,学校不惜巨资购置闭路电视系统,并为全校一百多间教室安装了摄像头。高科技使校领导只需坐在总控制室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一个教师的教学全过程尽收眼底。

即使这真能使教学呈现新气象,如果这样的新气象是以侵犯教师尊严、剥夺教师权利换来的,不也值得商量?但一个副校长在大会上说,只要你心里没鬼,勤恳教学,你还怕人看?凡是不想被人看的,都是心里有鬼的,水平有问题的,不安心工作的。

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被称为继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有关社会正义的著作,正是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制度性羞辱”的概念。马格利特区分了文明社会和正派社会:“在文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羞辱;在正派社会里,制度不羞辱人。”

很显然,“制度性羞辱”比日常的人际羞辱对社会肌体的危害更大。人际羞辱带有偶发性和暂时性,一旦羞辱过去了,时间一长就如烟云过眼,而制度性羞辱却是长期性、一贯性的,长期处于制度性羞辱的淫威之下,社会整体的羞耻感就会渐趋麻木,遭受羞辱也就没有人会在意。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狱友瑞德对安迪谈囚犯和监狱的关系:“监狱是个有趣的地方,开始你恨它,接着你适应它,日子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像是要为瑞德这句话做注解,电影中另一个狱友老布在坐了五十多年监狱之后,离开监狱就再也无法生活。我已发现我对头顶的摄像头已经不再有抵制(恨),而是已经开始习惯(适应)它,接下来,也许就是将来有一天,没有了摄像头在上面看着我,我反而无法开始讲授。瑞德这句话其实描述了人如何一步步被“体制”吸纳的过程,而监狱和摄像头,在社会学的意义上,都是“体制”的具象化。

□陈四益

挤出效应

反腐、肃贪,大得民心。官场腐败的蔓延,误国害民,天怒人怨。自古至今,多少个王朝都败在官风的腐败。事到如今,不大力反腐,颓风难挽。有人指为“运动式反腐”,略有微词,但要挽狂澜于既倒,菩萨心肠也需霹雳手段。把权力关进笼子,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需要有总体设计,需要有法律规范和从政的环境。反腐的正面效应正是要求得为管理理念的根本认同。这是总体设计的基础。

前些年,形容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现场,张袂成阴,挥汗成雨,私心窃有所惧,因为它蕴含的心理仍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与科举时代并无不同。

连续扩招,大学膨胀,可毕业后求职的热门,不是做研究,不是去创业,更不是去农村,去山区,服务社会。倒是为官一途,风生水起,独领风骚。但好像也并不是“学程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老调,倒是因为一登官门身价百倍,不但权位,而且地位、学位、财位都不求自来。于是,私心又窃有所惧。如果当官的目的在于为己,欲求勤于公事,官风清廉,其可得乎!二十年间,官风颓靡,事有必然。

大力肃贪,惩治已有的贪贿,当能收效于一时,但能否使后来者从此改弦更张,尚难逆料。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实属必要。

三十年前,曾问几位香港青年,大学毕业后想做什么?竟无一人想当公务员。所以然者何?答曰:年轻,想去企业,工作虽不稳定,只要努力,收入却高。中年以后,有了经验,有了家底,愿意服务社会,或者考虑当公务员。可见,公务员的吸引力不在待遇,而在服务,不像我们这里,一朝权在手,可以拿博士,可以揽课题,可以到处“讲课”,可以兼职公司,可以暗输信息,可以坐收好处,使逐利之徒削尖脑袋往官堆里钻。看来,要使官场清静,让逐利之徒觉得官场除依法行政、服务社会,别无可图,才是长久之计。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官场清白的挤出效应。

咱们的“苛刻”

□孙贵颂

扩展到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你做了99件好事,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便立刻认为你不行:“没想到他还是这个样子!”

中国人本来最讲恕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是农村许多人家过年时最爱贴的对联。但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同胞变得不那么和气,和善了,喜欢讽刺、挖苦、嘲笑别人,对人愈来愈苛刻,对别人的伤害有时在不经意间就能流露出来,成为一种本色和本能的表演。

而当这种习惯浸润、侵蚀到政治领域中,就变得更加可怕。对一个人的要求要一贯正确、毫无瑕疵,否则便有可能被怀疑、冷落甚至抛弃。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曾写到过这样一件事,她爱人杨述有一个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胜利后,他被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派入国民党军统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一千数年,最后当上了国民党少将。到了解放初期,肃反运动开始,杨肆以反革命罪被捕。杨述夫妇揣度他有过叛变投降的隐情,多少年来一直待其冷淡。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肆的结论出来了,原来他的被捕,就是因为他做过国民党少将。韦君宜痛心道:“我们就是这样,一方面,对组织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对人过于警惕,过于苛刻。由于这样的心理,就出现了一面喊口号注重实际,一面又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制造冤假错案。”

可见,一个苛刻的民族,往往也是容易办傻事、犯错误的民族。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文革”。那个时期,或者当造反派,或者当保皇派,二者必居其一。有人想逃离那个乱哄哄的场合,做一个清醒者,却被扣上逍遥派、中间派的帽子,结果是逼良为娼,天下大乱。

苛刻的反面是宽容,是理解,这才是一对美好的字眼,也是人类纯洁的情感体现。只有敦厚、质朴、和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不小肚鸡肠,不斤斤计较,宽宏大气,心胸开阔,目光高远,既能容事更能容人,才能成就大事,铸就大业。

现在大家都在半真半假地说着“为人要厚道”的话,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很强烈的摒弃苛刻、倡导宽容的要义,无论个体还是团体,都应作为最基本、最起码的精神要求。

投稿邮箱:
qlwbzawen@163.com